



偃月城访古

——田园调查手记之十二·偃月村

□ 叶继程

2月4日立春,春打六九头。本以为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不料江汉平原阴着一张外交脸。因早与《观音垱镇志》编辑部的几位朋友约定,探访偃月城遗址,天气霾着,亦无选择。

时近年关,G318国道上,车辆较往日更加密集,车身上裹挟着异乡的滚滚风尘。江汉平原上,冬小麦铺展着沉重墨绿,田埂边野菊凝着白霜,几株早梅疏枝蕊蕊,剪映着偃月村的温柔。车行至偃月村地界,柏油路戛然而止,爬满荒草的泥土路,在田间蜿蜒。路的尽头,西垣南端那方清代青石石碑横屏眼帘——像守着田埂的孤叟,碑面阴刻的“关帝偃月城故址”八字,百年风雨磨得边角发浅,却仍在田埂与夯土垣间执拗挺立,成了这片土地最醒目的历史硬戳。

乡亲们把这里叫俞潭城,“俞”字读chóu,是江汉平原少见的姓氏。《观音垱镇志》执行主编陈大林先生告诉我们:这是早年俞姓聚居者留下的地名,后因音近传作“俞潭城”“俞潭城”,直至乾隆《江陵县志》载“城状如偃月,一曰偃月城”,这个因形得名的名号,才顺着长湖水波流传至今。而城名背后,最让村里人津津乐道的,仍是关羽筑城、驻军的传说,这则口耳相传的故事,在夏夜纳凉的竹床上,冬日围坐的火塘边,被讲了一代又一代。

相传,三国时关羽镇守荆州,某日策马至此。与农夫打赌,誓于鸡叫前在长湖之畔筑四十八里城池。他挥刀筑垣,踏马成壕,城垣将成时,误将村妇簸谷声当作鸡鸣,仓促收工,留下弯如新月的未竟残垣,得名“偃月城”,东南角缺口也成老人口中“关将军的遗憾”。关羽亦以偃月城为驻军之所,单日在金潭镇操练陆军,双日于长湖堰堤山训练水军。一次暴雨夜泊泥港湖船家畅饮,酒醒后发现大印遗失,幸得渔民拾得送还。他感念此间淳风,便在乡民屋台旁垒土筑墙,勒碑铭记,命名“印台”,此地后冠“新”字更名新台村,传为佳话,后人诗赞:“当年关羽镇荆州,操演英雄宿水滨。诚意村夫留美善,新台不负印台名。”

张飞闻讯挑土助兴,赶上俞潭城边时闻“鸡鸣”,见城垣初成,便将两箕土倾于路边,化作“张飞遗土”。虽经岁月侵蚀,这两处土堆仍比周边田埂高出几分,与清代石碑上“俞潭店者,关圣帝旧驻军处也”的刻文,共同印证着三国传说在乡土间的深厚扎根。多少年来,村里人守着这片夯土,春耕秋收时路过城址,总会不自觉放慢脚步,仿佛怕惊扰了当年驻兵于此的关将军。

蹲下身,我摩挲那方清代石碑,青石表面布满细密冰裂纹,是百年日晒雨淋淋出的掌茧,刻字凹槽里嵌着深褐色泥垢,混着冻土的腥冷与枯草的淡香。指尖划过“偃”字撇捺,能摸到石屑在岁月里磨出的圆润弧度。碑座半陷在湿润黑土中,贴着几株荠荠菜,嫩白根须缠在碑脚麻点纹肌理里,似在替土地攥住这段传说。陈大林先生说,

这碑原是一对,另一块刻着俞潭店与关羽驻军的记载,嵌在城垣上,还有一块立于俞潭店旧址。如今俞潭店虽不复当年集市模样,只剩几栋土墙黑瓦老屋,但那方石碑仍被村民细心保护,虽字迹漫漶,仍能辨认“关帝驻军”字样。

沿着西垣残迹往北走,脚下坑坑洼洼的泥土混着夯土颗粒,结着薄冰的土层踩上去脆响。城垣上长满芭茅与蒺藜,枯硬草叶为残垣添了几分苍劲生机。这是偃月城现存最完整的一段,长200米,高3至4米,基宽约15米,至墙顶渐收窄到3至5米,是典型的古代夯土城垣形制。伸手抚上墙面,粗糙质感隔着指腹,清晰可见当年版筑痕迹,一层层夯土叠压如书页,凝聚着古代工匠的心血与巧思。掀下一块松动夯土,断面混着炭屑与青灰色泥质陶片——这便是解开偃月城真实年代的钥匙。

民间三国传说再热闹,终究抵不过考古发现的真实答案。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与江陵县文管所曾多次对偃月城遗址勘探试掘,城址内3米厚的文化堆积层叠压着宋、明遗存,核心区出土文物均属宋代,并无三国时期陶片、铜器、砖瓦。考古人员清理出大量北宋泥质灰陶片、青釉瓷片及少量白釉瓷片,多为碗、盘、罐等民用器残件,带有宋代湖田窑、吉州窑风格,还有饰有云纹的宋代瓦当、筒瓦残件,与荆州地区其他宋代城址出土器物形制一致。

这些发现清晰表明,偃月城并非三国关羽所筑,实际建造和使用年代为宋代。民间流传的关羽传说,更多是后世乡民对三国文化的美好附会,是江汉平原这片三国文化沃土上,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情感寄托。为何宋代城垣会附会关羽传说?或许因其地处荆州城东35公里长湖之畔,是古代荆州东部重要要塞,而荆州作为三国重镇,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深入人心,后世乡民见城垣便自然与之联结,清代《江陵县志》与碑刻又将这份附会正式记载,让传说与历史交织,成了偃月城独有的文化特质。

东垣境况比西垣更为残破,30米长的墙基埋在大堤外苗圃队草中,被枯黄狗尾草、苍耳与杂树枝桠覆盖,若非陈主编指引,难辨是偃月城东垣。拨开枯草,可见夯土断面,夯层清晰且混着宋代陶片,只是经常年水土流失与人为扰动,墙基已比当年低了不少,部分与周边冻冻齐平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偃月村人,陈主编告诉我们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垣还较完整,西垣能沿墙顶走到俞潭店,东垣也可见完整轮廓,后来村民盖房取土、修路垦荒,“巴掌大扁担长,都要种上革命粮”城垣渐遭破坏。若干年后,等文物部门保护时,只剩如今两段残垣。他指着不远处老屋,屋基砖块中仍可见城垣旧砖痕迹,那些带绳纹的宋代青砖,被村民垒进墙里,成了历史的另一种延续。

陈大林先生是偃月村土著,亲眼见证偃月城变迁。他兴致盎然地谈起幼时印象:“那时候城墙上芭茅比人还高,冬日枯

茅覆着薄雪,我们一群孩子在城墙上跑,城根下挖蛴螬、捡瓦罐碎片,大人告诫我们说那是老祖宗留下的,不要乱扔。当年俞潭店有茶馆酒肆,逢集时十里八乡的人都来,热闹得很,城垣边老槐树枝叶茂盛,能遮半亩地的阴。”陈先生说话带着观音垱湖区特有的尾音,眼神望向夯土垣,似看见了当年热闹光景。他说,小时候听爷爷讲关羽故事,总以为是真的,长大后才知是宋代城池,但心里仍愿意相信,关将军曾在此驻兵饮酒,感念乡民善意留下印台佳话。

跟着陈主编往俞潭店旧址走,穿过一片长出新枝的柚树林,陈主编指着一处老屋墙基的石碑说,这是另一块清代碑刻,前些年修路被埋半截,村民发现后挖出立在此处,碑身刻“俞潭店记”,字迹漫漶,仅隐约辨认“关帝驻军”“宋代集市”字样。据《江陵县志》与考古资料,宋代俞潭店因大漕河疏浚,成为连通长江与汉水的漕运枢纽,商船云集,市井繁华,与沙市市齐名,南宋《舆地纪胜》载其“去城六十里,亦江陵一市井也”,而偃月城便是这处市井的防御屏障,守护着一方安宁。陈先生接着说,现在村里年轻人多外出打工,只剩老人孩子守着村子与城址,文保部门每年巡查,给石碑围了护栏,村里也立了保护牌,村民们都成了“护城人”,不再随意取土,还会主动清理城垣枯草。“这是我们偃月村的根,不管是三国传说还是宋代城池,都是老祖宗留下的,得守好。”朴实的话语里,听得出他对这片土地的真挚情感。看着远处冬麦与残垣,碑脚那从顶着嫩黄花的野菊,我心中生出别样感触。偃月城的魅力,正在于传说与历史的交织——三国烽火虽未在此点燃,却因乡民附会留下英雄印记;宋代市井虽淹没黄土,却凭考古陶片还原当年繁盛。那些夯土上的版筑痕迹、石碑上的漫漶字迹、口耳相传的传说,考古发掘的资料,共同构成了偃月城的历史,让这座宋代残垣有了温度与灵魂。从宋代漕运井到如今冬麦乡里,偃月城的夯土垣在长湖朔风中守了千年。传说里的兵戈佳话,终究抵不过眼前麦浪凝绿;宋代陶片,也终究与冬麦根须缠在一起,融于黑土。而那些刻在石上的字、留在土里的陶、藏在人心里的传说,不会消失,它们会随着冬麦拔节、季风的流转,在偃月村田垄间长满一季又一季沉硕的果实。

临别前,我再次回眸西垣南端石碑,湖风穿过芦苇枯穗,发出细碎声响,似百年前的低语,又似柳絮诉说岁月故事。碑脚野菊花在冻土上倔强绽放,像这片土地上的乡野村夫,像这座守了千年的偃月城。湖风薄凉吹过残垣,田埂,迁徙的候鸟从偃月城飞过,把遗址传说带往远方。而这片六气四时的土地,依旧冬耕春耕,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,佝偻着身躯的老农们,则世代代守着这些传说与历史,在江汉平原腹地,静静绽放着文史散文笔下独有的乡土美韵。

偃月城垣藏宋韵,荆乡传说绕城关。

楚史漫谈

斗缙：中华第一县的首位管理者

□ 余大中

斗缙,生年不详,卒于公元前691年,半姓,若敖氏,斗邑人,是楚武王熊通麾下的大夫。在中国行政制度史上,斗缙曾经留下特殊印记。他是史称“中华第一县”的权县首位行政长官,因为野心膨胀,发动叛乱,最终身死名裂。

权县,前身为权国,是一个邻近楚国的先秦小诸侯国,由商王武丁的后裔建立,国君是子姓,名为子元,史称权文丁。关于权国灭亡与权县设立,《左传》有明确记载:“初,楚武王克权,使斗缙尹之以叛,因而杀之,迁权于那处,使闾敖尹之。”杜预注:“权,国名,南郡当阳县东南有权城。”具体来说,就是在公元前704年,楚武王熊通率军攻伐随国,顺路攻克了权国,随即摒弃当时普遍实行的分封制,将权国故地设为县,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产生的“县”级管辖建制。按照杜预所注,权国的故地,大致上位于今湖北当阳东南。

因为参与灭权国有功,斗缙被楚武王任命为权县的首位行政长官,当时称“权尹”,亦有“县公”“权公”等别称,相当于后世的“县长”。楚武王对斗缙寄予厚望,而这一任命本身,也体现了楚国早期县制的特点,亦即:县尹由楚王直接任命,不世袭,直接对楚王负责。这些,是与分封诸侯高度自治截然不同的。值得一提的是,斗缙并非普通的大夫,据史料记载,他实际上是楚武王的叔父。从斗缙这一身份,也侧面说明,楚武王对权县的治理是给予了高度重视。

然而,任职后,斗缙心态逐渐发生转变。一方面,他认为“县尹”的地位和权力,远不及分封制下的诸侯;另一方面,权国遗民怀念故国,不断怂恿斗缙复国。最终,斗缙背弃了楚武王,率领权国旧贵族和遗民发动叛乱,企图恢复权国旧制并自立为权国国君。

面对叛乱,楚武王反应果断,立即派遣大军围攻权县,叛乱很快被平定,斗缙于公元前691年被杀身亡。平叛后,楚武王为杜绝后患,将权国遗民迁徙至“那处”(位于今湖北沙洋),另派闾敖担任新的县管理者,并由此总结教训,此后灭国设县时,均将亡国公族迁离故土,从而加强管控。

斗缙的叛乱虽以失败告终,却留下深远的历史影响。从制度发展来看,这次叛乱成为楚国完善县制的重要契机,推动了县制行政模式的巩固和推广,此后逐渐被各诸侯国效仿,最终成为秦汉郡县制的前身,影响了中国地方治理两千余年。从姓氏源流来看,据《姓源》记载,斗缙的子孙为避祸或纪念祖先封地,改以“权”为姓,不再沿用半姓斗氏,家族后裔由此融入了子姓权国的世系之中。

至于史称“中华第一县”的权县,具体位置究竟是哪里?一说是位于今湖北当阳,一说是位于今湖北沙洋。笔者认为,都有道理,因为权国的故地,大致上位于今湖北当阳东南,说当阳无可厚非;但是后来,楚武王将权国遗民迁徙至“那处”(位于今湖北沙洋),说沙洋也很明确。是否可以认为,“权县”大致范围在今湖北省荆门市沙洋或当阳一带?查阅当代文献,主要观点认为,“中华第一县”权县位于今湖北沙洋。

对于斗缙的一生,后人多以其叛乱为戒。文献认为,他本来可以凭借“中华第一县”以及“首位管理者”的身份名垂青史,却因野心膨胀葬送性命、背负骂名,斗缙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悲剧,更是警示后人:权力当有边界,欲望需受约束,背离历史发展趋势与信任者,终将自食恶果。

文化荆州·城事

湖北荆州城墙 11号马面考古——

从一段城墙看千年文脉接续

在荆楚大地的晨雾中,一段沉默千年的城墙剖面,诉说着文明的层叠记忆。日前,位于湖北荆州城墙11号马面考古发掘现场的荆州城墙考古遗址展示馆面向公众开放。该馆系统展示唐代至清代荆州城墙的演变历程,阐释我国南方砖城墙千余年的发展脉络。

荆州城墙现存城墙为明清时期建筑,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,城墙周长11.28公里,有6座古城门,均设瓮城,建城楼、箭楼,是我国现存延续时间较长、跨越朝代较多,由土城演变为砖城且保存完整的古城墙。作为“中国明清城墙”的重要组成部分,荆州城墙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。

11号马面位于荆州城墙北段东侧,2019年至2022年,为更好荆州城墙保护修缮展示工作,经国家文物局批准,荆州博物馆对其进行考古发掘,城墙剖面清晰揭示了城墙的内部堆积层次和建筑结构。荆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,为展示文化遗产保护成果,在文物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,荆州科学设计、精心施工,建成了荆州城墙考古遗址展示馆。

站在荆州城墙考古遗址展示馆内,眼

前是一道跨越千年的城墙剖面。它就像一幅纵向展开的历史长卷——唐代土垣、五代砖墙、宋代护坡、明代石基、清代修缮,各个时期的城墙如年轮叠压,形成“墙包墙”的奇特构造。

凝视这段剖面,看到的不仅是我国南方砖城墙的发展脉络,更是一个民族在时间长河中不断重建、始终屹立的精神象征。这段剖面最动人的地方在于,它并非“推倒重来”,而是以“层累式”的形式出现。每一时期的建设者都尊重并利用了前人的成果,在旧基上筑新城,每一次修缮加固都是文化的接续。

该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田勇介绍,这段城垣初为唐代纯夯土城垣,明确了本段墙体的年代上限,见证了早期土城的营建技术。五代墙体是最早的砖砌结构,采用错缝垒砌工艺,内侧夯土护坡分层夯筑,防御性能较前代显著提升,标志着城垣建材与技术的转变。宋代增筑夯土护坡,明代改为砖石外包,清代延续使用,这一完整序列为研究砖包城墙的形态与演变提供了关键标尺。该考古发掘项目获2022年度“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
“五代砖墙中发现大量汉代至唐代的墓砖,与《五代史》《十国春秋》等文献所载五代时期南平(荆南)国高季兴‘取家墓砖以甃城’相印证,是我国考古迄今发现最早的砖城墙。”荆州博物馆馆长杨开勇说。

进入宋代,荆州作为长江流域的军事重镇,战略地位愈发重要,城墙也历经三代改建。宋代并未推翻五代城墙,而是沿用其外墙,仅通过增筑内侧夯土护坡、加高墙体顶部、增设内排水水沟等方式优化强化功能,既适配火药技术发展后战场防御的新需求,又兼顾南方城市多雨易涝的防洪诉求。到了明代,荆州城墙迎来一次重大改建,采用砖石外包工艺。清代则基本延续使用明墙,最终形成了如今看到的墙体格局。

层层叠压的砖石,恰如中华文明传承演进的生动隐喻——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修缮、加固、创新,既尊重传统又勇于变革。据了解,发掘过程中,还发现“後”“鄂”字文字砖、明代“万历十年”文字砖等文物,使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形成完美互证。

荆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表示,荆州城墙11号马面堪称一部“活的城墙建造史”,该展示馆建成开放是推动考古成果转化、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,荆州将持续深化“考古+文旅”创新,搭建文明对话平台,让文化遗产真正“活”起来。

(原载1月31日《中国文化报》2版)

翰墨荆楚·名家



绿云玄玉
作者 郭方园

